



文化视角下的



中国古代小说

刘世琦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刘书成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714—081—X

I. 文… II. 刘…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1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4934 号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

刘书成 著

责任编辑:管卫中 王晓燕

封面设计:史春燕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246

印 刷:甘肃地质印刷厂

地 址: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西路 357 号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88 千

印 张:9.375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80714—081—X

定 价:19.6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序

赵 遼 夫

这部书浸透了一位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园地中几十年辛勤耕耘的汗水,凝结了他在传统文化的宝藏中不断探索、钻研的心血,反映了其在事业上追求的执着和思考的睿智与深刻。刘书成教授,这位在我省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成绩的中年学者,已经离我们而去,这部书便是他留给家人、朋友,留给学术界的礼物。

我之所以指出书成同志是一位“中年学者”,因为我觉得他走得太早了。他可能还有很多课题要完成,他的学问正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事实上,他的早早离去,也同他过于劳累有关。

我说书成是我省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这从甘肃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从书成教授本人的成绩,从他在推动古代小说研究上所做的贡献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近代以前,甘肃无论在小说的创作上还是出版、评论、研究上都很薄弱。创作上,隋代以前只有陇西安阳(今秦安县)人王嘉(字子年)根据故记编写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拾遗记》。唐代是我省小说创作最畅盛的时期,产生了著名的传奇小说家李朝威(有《柳毅传》)、《柳参军传》等传奇小说)、李复言(有《续玄怪录》)、牛僧孺(有《玄怪录》)。还有署有李公佐之名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

《古〈岳瀆经〉》、《庐江冯媪传》，都是名作。还有一篇《燕女坟记》，见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四姚玉京条，也是李公佐作。但我以为李公佐同李朝威是一人，姓李，名朝威，字公佐，号颢蒙，唐陇西人，大约生活于唐德宗至武宗期间（此问题将另为文考论之）。此为甘肃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辉煌时期，此后便再无继者。历数甘肃古代大大小小的作家，基本上都以诗文名世。辛亥革命以后，一些学者认识到小说的启蒙作用，随着报刊的增多和印刷业的逐渐发达，有写小说者。范振绪的《东雪草堂小说》，慕少堂的《醒世戏言》，署名鉴空的通俗长篇《国魂》，署名挾霜的中篇《陇上新舞台》等，便是这时期产生的。但总的说来，西北，特别是甘、宁、青、新几省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写小说的人还是不多。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情形大为改观，西北地区出了几位全国很有影响的小说作家，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小說；与之相应，当代小说的批评也比较活跃。我认为，近代以前小说是同城市、商业联系在一起的。交通发达、人口密集、流动人口多，印刷、发行、流通都便利的地方，创作小说的人多，甚至会产生一些职业作家（如明代万历以前的方汝浩、余邵鱼、余象斗等，万历中期以后的冯梦龙、陆云龙、凌蒙初等。他们有的是书坊主，也写序、作评）。唐代都城在长安，距甘肃较近，唐王朝又着意经营西北，平凉、秦州一带又是通西域和入川的要道，文人商贾到甘肃的多，加上唐代士子有“温卷”的习俗，故有的文人受风气的影响而创作小说。其他朝代则甘肃属于边塞之地，文化方面影响大的是经学和传统的诗文，民间流传书籍，也主要是这一类，所以从事于小说创作者几乎没有，评点、研究的人更是不见。就通俗小说而言，明前期福建为创作、刻印的中心，万历中期以后江浙为中心。至近代随着经济的繁荣，中心转移到了上海。所以，西北，特别是甘肃，近代以前一直对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抱着极为淡漠的态度。

也可能就是由于这个文化传统的原因,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人仍然很少,兰州大学和西北师院(甘肃师大)从事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老师研究诗文者多,研究戏曲者也有(如郭晋稀先生),但古代小说研究方面,几乎荒芜一片(据我所知,文革前的十六年中,总共只发表过两篇论文)。改革开放以后,先是有几位学者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取得了一些成绩,如乔先之、夏荷、王仁恩等。以研究元明清戏曲在国内获得颇高声誉的宁希之先生也曾在宋元话本等的研究上提供了很有分量的论文。真正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上形成气候,在省内外形成一定影响,是在刘书成任兰州师专中文系主任后,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由于书成教授曾担任《甘肃高师学报》的主编,他也以此为阵地,扶持了一些青年学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世纪之初,他筹建了兰州师专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所。凝聚了省内的研究力量,加强了同全国学术界的联系。

书成教授除担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之外,还为学生开设了选修课“中国古代小说宏观研究”。他发表学术论文近六十篇,有十多篇是刊在该学科的核心期刊《明清小说研究》上的,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的有十七篇之多,还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加以摘要介绍。他二次获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五次获甘肃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二次获三等奖;五次获校级一等奖。199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小说宏观论》获西部文化研究院特等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团结出版社“优秀著作”证书。应该说,他是我省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尤其在小说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的学者。

书成教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特色是:着眼于宏观的研究。在古代小说文化的理论认识、古代小说与宗教、古代小说的文

化内涵等的研究方面,都表现出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理论思考。在明清艳情小说原型结构、创作动机、创作心态的分析上,也表现出他的洞察力。关于小说文化的理论认识,他提出核心与外围、雅正与通俗、主要与从属这几个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的观察层面;认为小说研究应以中国大文化视角为切入点,从上位层次文化与下位层次文化、史官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这三个观察角度进行分析。他说,在上层次文化与下层次文化中,“小说属于后者,又仰前者之鼻息,依前者而发展——被定位于具‘可观之辞’的‘街谈巷议’、‘琐语’”;在史官文化与民间文化中,“小说属于后者,又向前者靠拢,……被定位于‘稗史’、‘小史’、‘野史’”;在雅文化与俗文化中,小说归于后者,而仰攀前者,依前者标准改造自己,“被定位于不登大雅而‘其言俗薄’的‘人间小书’”。这个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生存发展环境及在其中所处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学一直以诗文为正宗,历来被认为很有文学素养和理论水平的人很少有从事于小说创作与研究,原因即在此。

再如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常以“信实如史”、“羽翼信史”、“能与正史参行”等作为褒奖语,李开先《词谑》评《水浒》便说:“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金圣叹评《水浒》“胜似《史记》”,言“《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中来”,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谓“《三国》叙事之佳,真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于《史记》者”。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拟史批评”。而何文彤在《注聊斋志异序》中说:“聊斋胎息《史记》,浸淫晋魏六朝。”书成教授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脱胎模拟”说。对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他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中国人重宗脉的习惯导致的‘征实’思维定势,是脱胎模拟说的直接导因”。“古代小说创作本身的承传因袭导致的非创作性,是‘脱胎模拟说’产生的物质基础”。我认为书成

教授从小说创作自身和文化背景两方面来分析“脱胎模拟”批评理论产生的根源,很有见地。这当中既有小说创作中存在的缺陷,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特征。如小说间的承袭,显然是他说的“非创作性”(作者在其《中国古代小说宏观论》中归纳为蹈袭模拟型、因袭移植型、抄袭摘辑型、改写增饰型四种类型),而续衍又是小说进入商业文化领域后利用名作效应和“追踪文化热点”的一种手段,是文人借题发挥的一种创作方法;对话本的因袭则同中国早期长篇小说是在民间长期流传基础上形成的实际状况有关。至于对史传的承袭,则同中国小说的孕育与形成过程有关。

总的说来,我觉得书成教授这部书中集中了他二十多年中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的成果,是值得重视的。

书成教授毕业于甘肃师大(西北师大)中文系,近十多年来在有关会议上我与他也多有接触。我又担任《甘肃高师学报》的顾问,有时候也在一起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了解较深。他为人正直,又潜心学问,心无旁骛,虽承担行政职务而从来不放松研究工作。如今他的《文化视野下的古代小说》即将出版,写如上的感想,以表达对这位老校友和朋友的怀念之情,也与学术界朋友共商。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于滋兰斋

目 录

序.....	赵逵夫	1
第一章 古代小说文化的理论认识.....		1
一、古代小说文化的几个矛盾统一层面		2
二、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进行文化定位的三个矛盾 层面.....		14
三、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脱胎模拟”说的文化根基.....		27
第二章 古代小说与宗教文化		39
一、古代小说宗教文化研究的几个难点和误区.....		40
二、佛教文化影响下古代小说的三大功能.....		52
三、“纵欲——顿悟——出家”情节模式的佛教文化根基		61
四、道教文化向古代小说渗透的三个指向.....		71
五、道教房中文化与明清艳情小说.....		85
第三章 古代小说文化内涵的特性.....		100
一、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的文化内涵及功能		101
二、古代小说文化内涵模糊性成因		114
三、中国古代拟实小说形态发展进程		127
四、中国古代小说情欲描写衍演的三个阶段		139
五、论悲剧性历史小说的道德文化内涵		152

第四章 明清艳情小说研究	164
一、明清艳情小说的原型结构	165
二、明清艳情小说创作动机论	177
三、明清艳情小说创作心态论	186
四、明清艳情小说价值论	200
五、艳情与巫术共同孕育的一个“怪胎”——《灯草和尚传》 的宗教文化形态解构	214
六、西厢文化与古代小说	220
第五章 近代小说理论研究中的几个界限	231
附录：一个学者的生死观	王秋梅 264
追思父亲	刘 政 282
怀念刘书成教授	287

第一章 古代小说文化的理论认识

古代小说文化作为民族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为全面集中地反映了古代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精神内核,使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以审美的方式储存在艺术形象之中。认真分析小说文化的内部构成,不难发现,它既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也并非是割裂的,而是存在着核心与外围、雅正与通俗、主导与从属等几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层面。认真分析这些层面,以求公允全面地对古代小说文化进行评价的前提。究竟怎样给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的定位,可谓见仁见智,纷繁庞杂,后世研究者尽可以选取不同角度,寻章摘句,得出不同结论,基本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努力以通俗形式包装雅文学,亦即将雅正的内容用通俗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种是企图以雅正思想装点俗文学,亦即在俚俗内容的描写中插入正统教化的议论。这两种倾向的合力,使得作品雅不能雅到家,俗不能俗到底。笔者以为应以中国大文化视角为切入点,从上位层次文化与下位层次文化、史官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这三个相互纠缠的矛盾层面,探迹寻源,深入析理,才能认识和掌握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对小说进行文化定位过程中所受的观念上的制约和操作上的失误。而从文化角度考察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上“脱胎模拟”之说的成因有三:在史官文化大背景下,“历史化思维”所导致的“拟史批评方法”的泛化

延伸是此说产生的本源；华夏民族崇宗重脉的文化精神所导致的以“无一字无来历”为上品的思维定势是此说的直接导因；古代小说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承传因袭现象所导致的创作的非创作性，为此说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沃土。“脱胎模拟”说虽有其依据和合理性，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具体表现在：理论体系上显得零星散乱；研究方法上觅旧遗新，重流轻源；评论中牵强含混乃至离实。作为小说研究者，见流不见源或见源不见流两种偏向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一方面深入析理作品所蕴含的前代小说的基因，另一方面严密注视作品所独有的思想艺术特质。遗憾的是“脱胎模拟”说过分注重了前者而恰恰忽略了后者。

一、古代小说文化的几个矛盾统一层面

“文化”这一概念确乎是太大了。中国有个词叫做“有容乃大”，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叫做“大乃有容”。“文化”的“肚量”之大，几乎可以涵盖整个人类文明。然而，“文化”一词最早不过是王朝所施“文治教化”的指谓，正所谓：“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凡武之光，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2]“文化内辑，武功外悠。”^[3]随着“文化”概念的发展演变，时至明清，已是“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4]的大文化观了。至于近代通用的“文化”一词，就广义而言，则成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犹如广阔无垠的大海，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精神活动，就如同海洋里的生物，它们无不浸润其中，受其滋养，自身又折射出大海的光芒。古代小说文化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却能较为全面集中地反映古代文化的整体面貌和精神内核，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代表性和生命力的一部分。古代小说作为古代文化的一个

组成部分,有着特定的“古典性”文化意蕴。任何一部小说一经问世,便成为小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使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以审美的方式贮存在艺术形象中。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是小说文化内部存在的核心与外围、雅正与通俗、主导与从属等几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层面,以求公允全面地对古代小说文化进行评价。

一、核心与外围

就整体说来,古代小说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和作用,远在经典的思想 and 历史著作之上。这是因为:“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罔睡”,而通俗小说则将史氏所志之事“以俗近语,彙括成编”,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5]但是,并非但凡小说都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只有那些历久而不衰,放射出炫耀百代的光彩,且对民族性格的模塑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才构成了古代小说文化最核心的内涵。我以为,处于核心地位的作品至少应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其一,自身有着十分丰厚深刻的文化蕴涵。这里所说的文化蕴涵包括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两个方面。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文化的现实存在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这物质设备的形成从它所处的社会组织的布局中得到它唯一的意义,另一方面客观条件对于社会及道德观念的决定,最好从那影响着文化中社会及精神生活的物质设备,加以定义及叙述。”^[6]“物质文化是模塑或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习惯的历程中不能缺少的工具。”^[7]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在形而下的器、用与形而上的道、体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密切关系。文化的

这种特性要求小说不仅深刻生动地反映古代社会的哲学、宗教、道德、情感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而且应广泛真实地反映古代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方面的东西,并将它们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正因为处于核心地位的小说达到了上述要求,故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历代人们的反复推究与发掘。一部部名著仿佛已成为一座座宝藏储量巨大的矿山,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从各个角度掘进,总会有新的发现,并从发现中得到新的愉悦。

其二,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较大的轰动效应,并产生经久不衰的社会影响,一些效法模拟之作相继而生,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像《红楼梦》问世后,民间出现的“家家案头有一部象《红楼梦》”和钗黛两派“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的近乎全民参与的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十分典型的。至于名著之后各种续作、仿作等“跟风”之作接踵风涌,并各自形成独立的类型群落的情况,更是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的特有现象。对此,下文中将有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其三,作品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引起学术界广泛持久的关注。当时及后世文人学士以极大的兴趣凭藉自己的学识、修养,从各自所处的时代氛围出发去体味、探究作品文本,从而得出虽各有差异,又都不乏精到见解的结论。这些结论的总和又形成各自专门的学问。

上述三个特征互有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延伸。以上述特征为标准来衡量,能够入围核心的作品为数不多,但这些核心作品却各自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并对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行为方式产生过深远影响。如《世说新语》、《儒林外史》之于士文化,《三国演义》之于道德文化和智谋文化,《水浒传》之于侠文

化,《西游记》之于神魔文化,《三言》、《二拍》之于情文化,《金瓶梅》之于市井文化与性文化,都是无以替代的作品。《红楼梦》作为古代小说的颠峰之作,是小说文化的“总汇”。它不仅涉及到戏曲文化、绘画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园林文化、游艺文化、石文化等诸多显性文化,而且富含儒文化、佛文化、道文化、巫文化、梦文化等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尤其它是我国情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小说中的“情”字已逸出通常所说的男女之情的范畴,而以其哲学的意义超越生命,涵盖万物。

以上谈的是小说文化的核心,核心之外的那些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作品便属“外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核心与外围并非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承继、相互促进的。有人说,“每部名著都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代表,而那些非名著不过是某种文化现象的衍生物。”^[8]我以为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儿,因为一部名著产生后固然会衍生出一批类型相近的作品,但任何名著的产生又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在它问世前,总会有一些非名著(不管是小说、戏剧、笔记、还是民间说唱艺术)的成功之处给其以滋养,那些败笔则启发它不要重蹈覆辙,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才使得名著得以升华,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特征。因此,对那些身处“外围”的作品也不能等闲视之。拿唐传奇来说,尽管它很难用一种文化现象来解释,其中的某些名篇也因思想文化容量有限而未能形成独立的文化现象,但却往往与某种文化现象紧密相关。且不说《游仙窟》之于色情文化,《李娃传》、《霍小玉传》之于游妓文化,《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之于梦幻文化,《任氏传》之于鬼狐文化,《虬髯客传》、《红线传》、《聂隐娘》之于侠义文化,均有开拓之功,仅就爱情传奇《莺莺传》来看,谁又能否认它对情文化的影响呢?《莺莺传》开启了“西厢文化”的源头,而“西厢文化”对后世爱情小说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二、雅正与通俗

古代小说历来被划归于俗文化的范畴。这种作法早在孔子言论中就已显露端倪。《论语·子张》曰：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种将“小说”视为“小道”，加以鄙视的作法，虽然长期影响着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研究，但是对小说“必有可观者焉”的评价又使得古代小说理论界从来没有停止过使小说由俗向雅的努力。唐·刘知几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9]宋·曾慥说：“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10]明·胡应麟曰：“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11]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所处的尴尬地位：理论家们一方面不得不首肯小说“小道”俗文化的卑微地位，另一方面又遮遮掩掩将小说向典籍文化靠拢贴近。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况，到后来似乎有所改变。不少理论家着力强调小说“通俗”的好处，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云：“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故只有通俗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这样才能收到“可喜可愕，可悲可泣，可歌可舞”，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的艺术效果，“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这种说法较之此前的理论，对小说“通俗”一面的肯定更理直气壮一些，但是从本质上看来，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要小说这一本属于俗文化范畴的东西背负起雅文化或雅文学形式难以承担的重任——向为数众多的读者传播文化，实施教化。也就是说，要求小说这种一直被视为“小道”、“末流”的文学形式去表现社会的正统思想，去进行文化概念、文化知识的阐释和疏解，以导化民情，起到经史难起的劝戒作用，

使小说既是故事载体,更是一种文化载体。

到了近代,随着维新派适应变法图强的要求,倡导“小说界革命”,将小说之价值和地位抬到至高无尚的地步。称“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也”^[12]，“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13]。尽管他们的论述仍旧着眼于小说“易传行远”，“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14]的特点和小说“宗旨所在，则在乎使民开化”^[15]的功用上，但从改变小说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屈从地位的角度来说，却有振聋发聩之功。

其实，传统的文化形态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一为典籍文化，一为风俗文化。前者作为封建正统文化的代表，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后者则是人民大众世代积累并赖以生活的文化形式，体现的是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性格。通常又习惯称前者为“精英文化”、“雅正文化”，称后者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正如传统文化自古就有雅俗之分一样，古代小说文化自身也涵盖了雅俗两个不同的文化层面。

首先，小说本身存在雅俗之分。一般人都认为小说文化是一种与精英文化形式有着很大差别的大众文化形式，但却往往忽略了一部分小说原本就属于精英文化范畴，而反倒与大众文化不搭界。如魏晋时的《世说新语》属文人之作，其读者亦为文人，作品并不以宣扬教化，激励事功为目的，其所反映的是士族阶层的多方面的生活面貌和他们的思想情趣，要求的是摆脱世俗利害得失、荣辱毁誉，使个性得到自由发扬，精神得到升华。它代表了科举制之前我国士文化的主流，也是整个封建时代士文化的精髓所在，对后世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样的作品，恐怕难以归到大众文化中去，说它是“雅正文化”、“精英文化”无疑更为贴切。再如，明代“四大奇书”显示的较多的是俗文化的特点，而清